

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

(五)

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些意见

夏 鼎

我以为古籍整理这工作，顾名思义并参考以往的经验，应该是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它的第一步工作是搞出一个整理书目来，把那些应该首先整理的，列入第一批中。然后又按缓急轻重，再加排队。每一部列入名单的古籍要查清楚从前是否整理过，整理得完备与否。有的已有整理好的本子，便可从书单中剔掉（如存书已售罄而需要仍多者，当然可以重印）。其余的便可根据需要来组织力量做各项整理工作，包括标点、校勘、注释、辑佚、今译等，还有整理的附属工作如影印善本，搞插图，编索引等。其中有的并不需要各项整理手段都具备，例如《红楼梦》不需要今译，但仍需要校注。有的书只需要标点。有的是需要各项具备的，但那也只能做到今译为止。整理好后的古籍也只能起参考资料的作用，这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写研究性的专史是一个学术工作，整理古籍也是一个学术工作，但是二者是两码事，似不能用把写专史也放在古籍整理中。写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等史学专著，那是文、史、哲各研究所的任务，规划由它们去做。但是不算是古籍整理，因之不能列入古籍整理规划中。但是各研究所的规划中古籍整理部分，仍应列入规划中，工作仍由它们继续去做。如把专题史部分作为补充规划，反而分散

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力量。此其一。

有些科技、医、农等方面的古籍，可以让别的部门和别的出版社来做。但是，这些书仍是古籍，它们的整理仍需要校勘、训诂、注释、标点、今译。并且我国古籍中有许多是难以归类的，有的一本书中便包罗万象。但是它们仍都是古籍，需要由古籍整理专家和农、医、科技专家共同协力来整理。我主张具体工作可以仍由原来的部门继续负责，需要古籍整理小组协助的地方，可以就力所能及的加以协助。但是仍应纳入整个古籍整理规划中来。此其二。

我以为整理古籍第一步是整理出一个曾经精心校勘过的本子，作为定本。有时这需要找到一个善本作为底本，用多种不同版本对勘，择善而从。其次是注释，可以包括训诂和考证。有时利用考证的结果，以“理校”来改正错字。再其次才是标点（指新标点）和今译。前两步是清代乾嘉学者已做出许多成绩，最后一步的今译是五四运动后才开始的。如果没有整理好的本子，又不经过训诂和考证的工夫，那么便不能真正读懂古籍。标点和今译一定会错误百出。所以，我以为除非已有好的本子，否则整理一本古籍是不能由标点开始的。

古籍整理中一般所谓注释，实际上包括“注释”、“校释”和“笺释”。如果“校释”中包括“校误字”和“校时间、地点、人名的错引、异说”，这便包括校勘和考证。名物训诂和音读，我同意“实在没有必要去代读者查字典、查辞书”。但是在普通的辞书和字典中所没有收入的生僻字或罕见事物，或者虽被收入而误释的，仍应加注释。我同意这样的意见：一切注释，都要求简要，力戒烦琐。注释的主要目的是使读者能更深刻地了解原书，同时也有助于标点和今译。（笺仍是注的意思。郑玄注诗，因为已有毛注，所以改用“笺”字，兼有表明毛义的意思。《六艺论》谓“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

古籍整理有时要附带做一些工作，例如辑佚、复印孤本和善本、编索引等。但并不是每一部古籍都需要这样做。善本的复印，一方面可以作校勘之用，另一方面也可作为文物的复制，保存文化遗产。这和孤本的复制能起同样的作用。我主张再将《四部丛刊》（有些《古逸丛书》本也可收入，因为这是缩印的，与《古逸丛书》本用大开本精装者不同）三编出齐，并且继续下去。至于《四库全书》，存世的只有三部半，近于孤本，但不必复印。这书就版本而言，乱改误字很多，是一劣本。大部分书都有校好的版本存世。台湾省已在陆续复印全部《四库全书》，这种事让他们去做好了。但可选印《四库珍本丛书》第二集。索引为工具书，可出单行本，但篇幅不多者可附在书后。《三通》或《九通》及《会要》不能归入工具书中。这类“政书”，已有的自然可以作为古籍来整理，列入规划中。但是如果另行编纂一部新的政书，那是新著作，不是整理古籍。

所谓《汇编》，那些已有的《汇编》本身便是古籍，可以增入新材料。但是我以为暂时似可不必再化工夫新编宋、明、清的诗文《汇编》。宋以前的是带有辑佚的性质。从宋代起，因为有了印刷术，诗文集的数量大增，并且时代较近，传世者多，真是“汗牛充栋”，似乎没有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全部加以印刷的必要。丛刊类则与下面丛书没有什么分别。关于丛书，我主张把丛书集成第一集所未印的补齐（约全部三分之一），这真是事半功倍。我不主张把丛书打散了分类再编《丛书专录》，而主张可编些某一专题的书目索引，可以包括单行本，不限于丛书本。许多古籍另有善本或通行本可供利用，而丛书本有时是删节的、误改的、或误刻的劣本。至于图录，在整理过的古籍中，有的可加插图，篇幅多可以单出。这等于注释的图释类，从前学者也曾编过，如《考工记图》、《水经注图》等，方便读者不少。古物图录如甲骨文、金文、汉简、敦煌卷

子和碑版墓志等以文字为主的，需要做释文和考释的工夫。这类图录可以算是特殊的古籍，可以列入整理计划。但是像《名画选录》、《陶瓷选录》、《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图录，可以让别的部门、别的出版社组织力量来搞，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可以不管。

总之，整理古籍的最终结果，是把重要的古籍通过校勘、注释、标点这几种手段，加上一些附带的整理工作，以便出版一些仔细地整理过的古籍；其中工农兵和一般群众所需要的，一定要根据整理好的本子加以今译出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应加以重视。

现在我国各条战线上都在争取做出超越前代的成绩，我希望古籍整理工作也同样地做出超越前代的成绩来。

关于古籍今译的一些意见

王 力

(一) 今译古籍，应先列原文，然后登载译文。译文可能有不妥处，让读者核对原文判断得失。

(二) 今译史书，应列前四史。如人力不够，可以先出选本。

(三) 今译书目，建议应有下列诸种：

诗经译注 文心雕龙译注 史记今译 汉书今译 后汉书今译 三国志今译 老子译注 庄子译注 屈原集译注 战国策译注 国语译注 孙子今译 世说新语今译 资治通鉴今译 史通今译 吕氏春秋译注 淮南子译注

(四) 今译首先要求“信”“达”，再求“雅”。所谓“达”，指的是明白条畅易懂的白话文，不是半文不白的翻

(五) 校注本应尽可能影印善本。鉴于从前排印本错误很多，采用影印善本的办法必须强调。注码可以加在影印页上，校语也算是注，加注码。一切校注都放在正文后面，不插入正文。

(六) 建议整理出版一些汇编，例如：

二十四史志书汇编，如天文志汇编，食货志汇编，地理志汇编，职官志汇编。

九通分类汇编。

韵图汇编，先出五种韵图（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切韵指南）汇编。

谈谈辽、金、元史籍中少数 民族的译名等问题

韩 儒 林

一、毕沅《续资治通鉴》中辽、金、元三代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采用的都是“钦定”《三史国语解》的改译。我认为应当依据未改过的三史本子统统改过来。

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下令将辽、金、元三史及同时代文集的少数民族人名、地名一律改译，《辽史》据索伦语（达干尔语）改，《金史》据满语改，《元史》据蒙古语改。象这样师心自用、擅改史文，只会给后来的研究者增加麻烦和困难。例如《元史》中人名地名，有的译自蒙文，也有不少译自阿拉伯文、维吾尔文、藏文和他种文字，都用蒙文来改，就不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即使是译自蒙文的，时代不同，读音上也有差异，以今音律古音，同样是不妥当的。清代许多有

名的学者，曾使用各种托辞抵制乾隆“钦定”的改译。赵翼倒填著书年月，然后说：“臣纂辑《廿二史札记》时，第就坊刻辽、宋、金、元、明旧史为据。今蒙高宗纯皇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所有人名、地名，一一翻译改正，始知数百年以来皆承讹袭谬，今日方得本音。”他在书后作了个新旧译名对照表表示恪遵功令，其实是为了免除学者阅读之苦。魏源写《元史新编》，借口“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官书，即在京师亦难购觅，况南方下士乎”，仍用没有改过的旧名。毕沅编纂的《续资治通鉴》，是继《资治通鉴》之后一部便于使用的编年史书，目前还没有其它适当的书来替代它。但毕沅身为前清重臣，所处的政治地位使他不敢不采用乾隆“钦定”的改译。虽然在每一个改译名词初见时都注出它的旧名，读者仍然难以立刻记住这么多毫无道理的改译名词指的究竟是何人何地。对使用这部书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折磨。将所有改译都按旧名改回来，不但不会降低、而且只会提高这部书的学术价值。五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续资治通鉴》时，我曾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重新提出来，希望趁这次古籍整理的机会妥善解决，以便减少青年读者和文史工作者使用这部书的困难。

二、解放后我国重印的古籍不少，一部分还加以标点，用起来较为便利。但是为古书作索引的还很少。有时为搜检某一方面的史料，甚至只是一、两条材料，就不得不将一部卷帙浩大的古书作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思想准备。我认为应该有系统地给廿四史、通鉴等重要古籍，分别作出索引，以减省学者翻检之劳。从前颉刚先生曾作过《尚书通检》，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日本学术界为辽、金、元史所作的索引或语汇集成，每个词条下都带有简要的原文，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中外学者手头必备的工具书。我们今天编这一类工具书，当然不能倒退到过去的水平之下，也不应该自甘落后于国际学术界同行已经达到的水平，应当采取语汇集成的方式，在词条之下注出扼要的原

文。这个工作，希望能有一个规划，通过分工合作、集体努力，尽快搞出来。

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是在和外国隔绝的状态下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在研究。所以，我们必须开扩自己的眼界。在这里，我觉得以下两点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第一，有关兄弟民族、历史上的边疆地区、中外交通的史籍整理工作，除校点而外，应尽可能优先组织力量进行注释。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们的研究对象绝不能局限于汉文史籍，必须尽可能详细地占有各个时代的少数民族和邻国史籍中的有关史料，尽可能充分地吸收国外东方学家的学术成果。西方及日本东方学的发展虽然曾经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其中不少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只有置于当代世界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综合成果的坚实基础之上，才能高质量地进行下去。第二，对于少数民族文字（如藏文、维吾尔文等）的珍贵文献古籍，包括新疆出土的大量回鹘文书等，也应加紧组织班子进行研究和整理。以上两点如果做得好，我们就能培养出一批年轻的专家，改变目前在这些比较特殊的学科领域中人材缺乏的现象。

搜集、整理、出版唐以前写本书

常任侠

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我很想作一些事情。我过去有这样的想法，唐以前写本书，流传不易，很想尽可能收集起来，分别印成总集，流传世界。因此曾计划编集以下各书：

- 1、汉音简牍
- 2、北魏隋唐卷子（包括敦煌发现，国内外公私收藏）
- 3、西陲古文书（包括吐鲁番等地出土）
- 4、唐以前碑志集录（自秦刻石以下）

虽然怀此志多年，但默念一个人很难完成，必须集合群力和出版机构，共同协力，方能实现。

近见我在南京大学1928年的同学潘重规，已在台湾着手整理敦煌藏书，我很想就上面的计划中，提前集印敦煌卷子，先将北京图书馆所藏、天津图书馆所藏（周叔弢捐献）、大连图书馆所藏（大谷先瑞发掘收集品）及各公私收藏印出。然后再印英伦、巴黎、苏联、日本的藏品（国外的潘君可能已着手，如书出便不急于重印），分年完成。

我与潘君同在南大文学院同系，同学于王伯沆、黄季刚先生，颇不甘于落后，因此毛遂自荐，争取工作。今年七十九，期以十年完成。这个学术工作，还可团结台湾以及海外的学人，将来的成果可以流布世界各博物馆、图书馆，以光大祖国的文化影响。

希望影印几种词籍等书

唐圭璋

北京图书馆所藏毛校《六十家词》，希望能影印。

天津图书馆所藏天一阁抄本明吴讷《百家词》，也希望能影印。

北京图书馆所藏元刊《草堂诗余》，署名宋何士信的，也望影印。日本清水茂教授寄我的元刊《草堂诗余》，时间、地点刊的不同，且有缺叶，又无何士信姓名。

以前我借过赵万里先生两种照片：（1）日本宋刊本黄大輿《梅苑》，（2）明杨慎《百琲明珠》，如能寻到，也望影印。

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日本刊本《全芳备祖》，国内无刊本，也应列入规划影印。

为《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进言

田 余 庆

标点本《二十四史》出版以后，中华书局立即着手编辑出版《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梁玉绳《史记志疑》、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王仲犛《北周地理志》等已经刊出。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

由于《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我想到了四十余年前刊行的《二十五史补编》。《补编》本来是配合开明书店版《二十五史》而问世的，解放后由中华书局重印。现在编纂的《丛刊》，实际上可称是《补编》的姊妹篇，前者是正史表志的资料，后者主要是正史记传的资料。有了这两部大书，配合使用，阅读正史就方便多了。

作为一个急切等待的读者，我提出几点希望和要求，千虑一得，聊备参考。

第一，关于《丛刊》子目问题 由于未见《丛刊》编辑宗旨，不知道原拟收录的范围。我觉得最好按照当前多数文史工作者的比较迫切的需要，根据能够流传久远的原则，以正史种类区分，选定子目，例如《史记》研究资料若干种、《汉书》研究资料若干种等等，发表出来征求意见，陆续调整充实。一时搜集不全，也没关系，以后还可以出续编。凡是涉及多种正史，分量较大，又早已以专书形式刊布流传的，如《二十二史

札记》、《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等，不必收入本《丛刊》。有些书涉及数史，但分量不太大，流传又不太广的，可以考虑拆开散入各部正史研究资料中。可收的书，以尽量收入为宜。《二十五史补编》收书，每种多则百余卷，如吴卓仪《汉书地理志补正》，少者一二页，如卢文弨《史记景惠间侯者年表校补》。只要是该收而又有用的，就应当细大不拘，兼收并蓄。当代学者的研究作品属于本《丛刊》范围以内的，也宜一并收入。属于有关正史表、志方面的研究资料，建议暂时保留，将来辑为《二十五史补编续补》。

第二，关于《丛刊》出版问题 《丛刊》收书，姑且假定为二百种罢。现在每年整理出版一种两种，速度太慢了。即使每年出三种五种，十种八种，也得十几年，几十年才能出齐。时间拖得太长，就难免出现预料不到的情况，使《丛刊》出版受阻。所以我认为加快出书的速度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应当集中出书，一批一批地出，尽早出齐。抗日战争以前，商务、中华、世界、开明，都用了十数年、数十年的时间，大力搜访、编辑，出版了不少大部头的古籍汇编，成为近代以来古籍工作的大“工程”，许多前辈为此孜孜不倦，张元济先生更是毕生从事。好些古籍，本来散在各种丛书、全集之中，不便利用；有些甚至是稿本、孤本、罕见本，多年沉睡箱底，不见著录。由于这些大“工程”的完工，一下子使宝藏得到开发，使难见书成为大家都可利用的常见书。如果当年《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二十五史补编》等大部头书不是汇聚成套，刻期编印，集中出书，而是今年三两册，明年七八册，零星投入市场，散在人手，你买了这几本，我买了那几本，谁也难窥全豹，如果是这样，这些大“工程”也就发挥不了大“工程”的作用。钱大昕为《史记志疑》作序说：“分之未足为珍，合之乃成其美”。他说的是注文应兼取各家成果。其实出《丛刊》也正是这样，合而刊之，既便利目前使用，又能传之久远；分

散出版，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解放后《中国近代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经验。

我希望《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按正史种类分为若干集，每集一次出齐。研究成果较多的正史，可以一史一集，例如《史记研究资料丛刊》、《汉书研究资料丛刊》等；研究成果不是很多，或者原书分量较小的正史，可以数史一集，例如《南朝五史研究资料丛刊》、《北朝四史（连《隋书》就是五史）研究资料丛刊》、《新旧五代史研究资料丛刊》、《辽金史研究资料丛刊》等等。整集出书，还可以考虑出缩印本，以节约纸张，降低定价。读者可以按整部《丛刊》购买，也可以分集购买，还可以零册购买。凡整部或分集购买的，可以登记预约。

第三，关于《丛刊》整理问题 《史记志疑》只用点校，我觉得是合适的。《丛刊》所收，估计绝大部分是清人乃至近人所作，不需要作太多的整理，有点有校，就足够了。甚至为了避免旷日持久，延误出书，就是不用新式标点，只要圈点断句，像《丛书集成》一样，也无不可。标点断句自当力求准确，减少差错，但完全无误也是不可能的。解放后所出标点本《通鉴》和标点本《二十四史》，都是用力很大的大“工程”，但都不能说是完全无误；出现一些错误，也无损于这两套标点本古籍的价值。其实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比起解放前来，已经是认真细致得多了。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的《丛书集成》，世界书局影印的胡注《通鉴》，断句之误比比皆是。丁福保刻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断句之误也不少。记得过去读商务出版的《九朝律考》，凡例第一条是“律始李悝。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断句错得可笑。解放后中华重印此书，才把这个错误改正过来。即令如此，这对于解放前的出版机构说来，仍是九指和一指的问题，首先是功绩，然后才是缺点。古籍加工的质量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待。加工中的错误，

发现了，再版时改过来就是，不要求全责备，更不要因噎废食，以此延误出书。

有些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资料，散见于其它书籍中，似可加以辑录，列入《丛刊》中。王重民先生早年在杨树达先生指导下，从《越缦堂日记》和李慈铭的读书眉批中辑录出《汉书札记》等数种，即属此类。此种辑录不宜涉猎太广，贪多求全，只取资料较为集中的书籍，例如《颜氏家训·书证篇》、《困学纪闻》一类书以及若干种宋元明清人的笔记、文集检阅即可，否则势必旷日持久，多劳寡功。如果辑录工作目前无力进行，也可以在日后考虑编印《丛刊》续编时来作。

收入《丛刊》的书，如果有价值很高，难于阅读，而又有人从事过此项专门研究的，当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整理，在《丛刊》本以外另出笺注考证的本子。这对于重要古籍说来是锦上添花。不过花在精不在繁，更重要的还是锦。古籍的笺注考证当然力求丰富，但篇幅不宜搞得太大。

最后，还想谈一个不只是与《丛刊》有关的问题，即出版古籍也需要有市场观念。古籍市场可能比别的商品市场要复杂些，但并非没有规律。市场上的合理需要，对古籍出版也应起指导作用。有一个文科大学生，想买一部《二十二史札记》，跑遍北京几处较大的新旧书店，结果还是没有买到。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的事。有同志说，北京买古籍，常常是要什么没什么，只好有什么买什么。为了尽早解决或缓和古籍的书荒问题，可否考虑在大规模出版新的古籍以前，先把需要量较大而又有现成纸型的书多印一些投入市场？同样需要的书，按照先一般、后专门的原则，分别轻重缓急，首先满足大学生、中青年文史工作者手头必备书的需要。当然，也要快一点满足较高一级的需要。50—60年代印过的一些大书，例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等，市场上多年不见了，印一批出来估计也不太费事。听说《文苑

英华》已在重印。希望旧版重印速度快，种类多，分别轻重缓急，一二年内做到基本上满足市场的需要。就是新印书，也要有轻重缓急。我觉得《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在史部的大书中应有优先地位。附带说一下，对古籍需要最迫切的，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一般说来是“白手起家”，要买必备书很多，而工资却比较低，困难颇大。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买到一些便宜书呢？有些书是否可印一些普及本？这个问题，也是古籍出版工作中应当考虑的。

买书难的问题有产和销的两个方面。发行机构不甚健全，增加了书荒的严重性。据说书店卖新书，数月卖不完，就当作滞销书进行处理。这条规定用在古籍上很不合理。所以我建议扩大中华书局门市部，出售所有本书局出版的古籍，并尽可能多地代售外地出版的古籍。这个门市部的经营，不应当是有什么卖什么，而应当是该卖什么就有什么可卖。为了保证供应，势必增加书籍的储备数量和储备时间，由此增加的成本费用，应在书价上适当补偿。

关于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意见

〔蒙古族〕 李 鸿 范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兄弟民族，对祖国的形成、发展和统一，都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每一个民族在她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创造和积累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其中包括有文字的和口头流传的）。这些文化遗产也丰富了祖国各民族文化的宝库。是我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藏族的古籍，据说有一万种以上，仅四川省甘孜自治州德格印经院，就有经版二十多万块。满文档案就有一

百五十多万件。蒙古文的文献据内蒙编的不完全的《蒙文图书目录》即有一千五百多种，七千余册。维吾尔文的古籍（包括回鹘文古籍）也有二、三百种。彝族的古籍据说估计在万册以上。云南的傣族文字也有千年历史，他们的古籍也会不少。其他至今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有的用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记载过自己的历史或民间文学。有许多是至今还停留在以口头流传他们的历史和文学的状态。

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由于过去未重视搜集整理，在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平息叛乱（藏族地区），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严重地破坏和损失。如西藏拉萨的“噶丹寺”全部被毁坏，寺内收藏的文物和古籍也随着寺庙全部被毁。甘肃拉布楞寺加木样活佛的寓所里，曾收藏二千余包较珍贵的藏文古籍，被全部烧毁。许多在民间用口头形式流传的民间史诗和文学，也随着老年人的逐渐消逝，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如，贵州五十多万彝族人民中，通晓古典文献者只有九十八人，去年又去世五人。因此，抢救、搜集、整理工作非常迫切。

建国以后，在五十年代初期，有关民族地方的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也曾出版过少量的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如《五体清文鉴》，蒙文的《蒙古秘史》、《青史演义》，藏文的《西藏五臣记》等，都被打成“毒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对少数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采取了继承和发扬的正确方针。从一九七九年以来几年中，民族出版社和各有关民族地区的出版社，相继整理、出版了一些有关民族历史、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古籍。藏古文出版了《蒙古秘史》、《蒙古源流》、《黄金史》、《小黄金史》、《白史》等书；藏文出版了《西藏五统记》、《西藏五臣记》、《红史》、《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等书；维吾尔文正在整理出版十一世纪维吾尔族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编写的《突厥语大词典》，共

三卷八编，第一卷已出版，二、三卷将在今后几年内陆续出版等等。但目前还谈不上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因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予以重视，成立专门班子，制定规划，以期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

对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五点建议

饶宗頤

一、四部丛刊的改编

四部丛刊先后出了三编，选择善本及补苴缺叶，都已尽了极大的力量。对于善本之不倦改易，其经过具详于该书《重印刊成记》。但仍有问题，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来说，许多应该更换，有些罕见佳槧本，流存于国外，一时不易觅得（如国内所无的明汪瑗《楚辞集解》，在京都大学，即有二部）。

《经典释文》原据《通志堂本》，近来已将北京大学的宋本另印；日本天理大学藏宋本《庄子音义》，版本更佳。至于重点的书籍，有的应该选取多种本子一同印行，如《昭明文选》，非将李善注、五臣注并列，则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

二、多出专题丛书

商务的《丛书集成》只印行丛书百种，事实是选刊，而不是集成。由于近年分类目录学的进步，重印丛书，应该加以专门化，侧重某些专题，把同类之书摆在一起，配合学术上的分工，这样更有意义。象中华书局最近出的《琴曲集成》、湖南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分期用袖珍本印出，作为对研究某一问题著作的汇编，对于学人，裨益更大。

三、分门文化史丛书的改撰

从前王云五在《张菊生七十生日论文集》中发表他所作：《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一文，他拟订八十种专书，大部分已经出版。数十年来，新出土文物之丰富，为历史上所罕见，许多新知可为文化史提供无上材料。由今观之，以前商务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几乎任何一种，都须重新改写，这可以缓缓为之。

四、经疏的标点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已经有标点本，而群经注疏，尚付缺如。唐人的“正义”，把六朝的经说作一总结。诗疏及三礼疏里面保存许多珍贵材料，范宁的《谷梁集解》中有些关于哲学史极重要的作品，可以选读，可是无人注意。记得在法京时，一位从事《汉书律历志》译注的法国汉学者问我，清代钱大昕屡次提及《星备》一书，出自何处。他说遍查不得。其时我恰巧细读周礼旧疏，便告诉他在某处（保章氏）。他高兴极了，只叹惜经书没有标点，读起来很是不便。可见经书应该标点，方能给予文史界一些便利。

五、索引的汇刊或选印

现代学术的迈进，全靠工具书的帮助。在外国许多汉学家都从事编写某一书的索引，日本学人更不惜花了极大精力，去做这些为人耕耘而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现在许多要籍大半已有了索引。如果能按照它的性质，重加整理，分类汇刊缩印，读者可坐享其成。以前有些大部头的书后面附上索引，如《四部丛刊续编》中的《清一统志》便附有索引。我建议以后重印某一古籍，最好仿照这个办法，后面都附有索引，岂不嘉惠学人！